

罗梅君 著【德】
孙立新 译
朱茂铎 校

政治与科学

— 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之间的历史编纂



山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波恩 Inter Nationes 基金会资助翻译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
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er und 40er Jahren.

Von Mechthild Leutner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2

根据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译者前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轫于 20 年代,30 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刺激并推动了它的形成,到 40 年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这一史学流派逐渐建立起了自己完整的史学体系,这一史学体系不但在中国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直接影响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科学所发生的变化。有鉴于此,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饶有新意的研究论著不断刊布于世,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所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er und 40er Jahren),就是这样一部精心结撰的著作。

罗梅君,女,1949 年生。在柏林自由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90 年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汉学专业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除了本书,罗梅君还

著有《北京人的生死婚嫁——从 19 世纪到现在的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Geburt, Heirat und Tod in Peking. Volkskultur und Elitekultur vom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9)等著作。

本书原系罗梅君的博士论文,1982 年由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Otto Harrassowitz)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而且深入地探讨了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对 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批判性分析。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而作者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观点更具有启人思考的作用。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理论取向乃至政治信念诸方面的不同,作者的一些论述,以及一些学术观点,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自会有公正的判断。译者翻译该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中国学术界介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要成果,从而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翻译是一项严肃而又艰苦的工作,在此,译者力求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尽量准确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识见和文字水平所限,译文的行文、笔调可能与原著有一定的差距,舛错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对于原著引用的中文材料,译者曾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由于条件所限,个别书籍一直未能找到,有些引文只好采用直译办法。同样,对于一些海外华裔作家或者有中文名字的外国作家,译者也尽量核实其中文名字,但仍有个别无从核实者,只好采用音译办法。凡此情况,幸读者鉴谅。

另外,原著中的略语表和按发音改写说明等,因与中译本无涉,均未译出。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作者的同意,也得到了德国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的版权特许和 Inter Nationes 基金会的翻译资助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山东大学历史系朱茂铎教授在百忙中认真审阅、校看了译稿;王学典、张书学、王桂琴等同事和朋友则向译者提供了大量图书资料和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在译者赴德访学期间,王学典又根据有关规定和译者的信函,受托对译文进行了繁重的删削工作(在此意义上讲,本书是原著的选译本),谨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的爱人,孙虹女士,也为此项翻译做了许多工作。待译著问世,当以斯相敬。

孙立新

1995年11月22日

著者中译本前言

对于中国来说，本世纪 30 和 40 年代是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自 19 世纪末起，新形式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急剧形成，后来，国共两党 1927 年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日本自 1931 年起的侵略，又使之经受了特殊的塑造。在国内改革、革命与复辟激烈冲突，对外为捍卫民族利益，特别是抵抗日本侵略而进行斗争的紧张形势下，出现了第一批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叙述历史的论著。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努力把经济因素和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推动力量加以突出，“清理”按照儒家思想编写的、以大皇帝业绩为重点的历史。那些自觉而又积极地承担起这一任务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深受当时的斗争的影响，其本人也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使之在他们的著作中充分表现出来；他们正是以这些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说奠定了基础。

我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是由下列愿望所促成的，即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世纪中国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在此，历史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载体，或者说作为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历

史意识的媒介，便成了一个很好的主题，使我为之入迷。在这里，人们可以探寻对传统观念和现实社会发展富有创见的剖析。正是历史学家，有意识地面对时代要求，主动担负起了一种新型的为本国的未来负责的社会义务。他们为说明社会科学的启蒙作用提供了典型事例，也为说明下列情况提供了典型事例，即人们如何部分地把这种启蒙作用与新的宣传结合起来。

现在，我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翻译出版了，我非常高兴。我衷心感谢人们为此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热情地给予出版特许。波恩 Inter Nationes 基金会慷慨地提供翻译资助。山东教育出版社已经准备印行本书；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谢荣岱总编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温玉川主任。我也特别感谢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孙立新副教授和朱茂铎教授，孙立新副教授以其优秀的专业和语言知识认真地进行翻译工作，朱茂铎教授则对中译本进行了认真的审阅。

当然，我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观点是由我的时代和我的视角所决定的，因此，我非常欢迎读者提出有益的批评意见，以便能够使关于中国历史编纂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并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编纂之发展的整体和问题。

罗梅君

柏林，1996年3月

原著致谢辞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博多·维特豪夫教授(波鸿)和蒂尔曼·格林教授(杜宾根),他们作为鉴定人和第二鉴定人,对我的博士论文作了有益的评论。

本论文赖以写成的大部分资料是我1977年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在下列图书馆搜集的,它们是: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图书馆、胡佛协会图书馆、斯坦福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剑桥图书馆、马萨诸塞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曾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帮助。

我也感谢我的中国老师和朋友;他们在我1980年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过我。在我经年研读他们的论著之后,又亲身认识了侯外庐和胡绳教授,这使我感到特别幸运。在与两位学者进行有趣的交谈中,我也有机会使某些涉及他们生平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得以澄清。

衷心感谢英格博格·舒尔茨小姐为誊清书稿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赵永新先生代为书写中文符号。

此外，我还应感谢所有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曾给予我许多建议和精神上的支持的朋友们，他们的耐心和劝慰对于我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帮助。

当然，对论文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个人负完全责任。

罗梅君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著者中译本前言·····	1
原著致谢辞·····	1
1 引言·····	1
1.1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1
1.2 史料和研究状况·····	5
1.3 方法上的思考·····	10
2 历史学家小传·····	16
2.1 吕振羽·····	19
2.2 翦伯赞·····	24
2.3 侯外庐·····	29
2.4 范文澜·····	33
2.5 胡绳·····	37
2.6 何干之·····	41
3 1927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的政治和意识 形态前提·····	48
3.1 在西方影响下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	48
3.2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54
3.3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发轫·····	59

4 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	64
4.1 1927年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瓦解后的政治一意识形态形势.....	65
4.2 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阶级分析的尝试.....	71
4.3 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确定历史方位的尝试.....	78
4.4 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影响.....	84
5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	87
5.1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中政治一意识形态的发展.....	87
5.2 历史学家对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政策的认识.....	102
5.2.1 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性质.....	105
5.2.2 对三民主义的解说——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和政策的讨论.....	120
5.2.3 社会载体和领导权.....	127
5.2.4 把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置于世界政治的发展之中.....	133
5.2.5 动员民众.....	135
5.3 历史学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识.....	138
5.3.1 侯外庐“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	143
5.3.2 胡绳“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民主道路”.....	146
5.4 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科学的影响.....	148

6 掌握“历史的合法则性”和继承“历史遗产”——	
1949 年以前主要历史学家著作中政治与科学关	
系上的两个基本点	155
6.1 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中国的特殊发	
展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之中	161
6.1.1 吕振羽	169
6.1.2 翦伯赞	182
6.1.3 何干之	196
6.1.4 侯外庐	205
6.1.5 范文澜	214
6.1.6 胡绳	225
6.2 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	230
6.2.1 民族遗产的概念和评价	234
6.2.2 外国遗产的概念和评价	243
6.2.3 继承历史遗产的实际行动和受到偏爱的对象	
.....	249
6.2.3.1 中国的启蒙和启蒙运动	251
6.2.3.2 近代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258
6.2.3.3 封建社会中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	271
7 结语	284
注释	296
文献及其缩写目录	379
30 和 40 年代的期刊目录	423
英文提要	424

1 引 言

1.1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历史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形成社会意识的一个主要工具。政治争论往往依赖于追溯历史事件,政治对手总要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证明,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纲领则反射着“过去的教训”。历史学家集科学工作者和政治意见的代理人两任于一身,他们的工作始终带有政治使命。

科学与政治的这种相互联系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片面地以有利于政治的方式加以利用。当时,学术研究被置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之下了。然而,历史科学研究的停滞和知名历史学家的沉默充分表明,这种科学观既不是有效的,也未被普遍认可。当时,有人把历史科学宣传为一种政治的常用工具,但这一观点似乎只为少数历史学家所赞同,而这些历史学家是否具有科学的资格,还是大可怀疑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被以绝对对

立和专一的极端形式加以解释了。因此,可以理解,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就特别注意政治与历史编纂的关系,并且明确要求历史编纂为政治利益服务。这种情况适合于自司马迁起中国全部传统的历史编纂^{〔1〕},这种历史编纂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科学”,而是为当朝统治者的合法性提供证明的工具。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今——不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与历史科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程——它恰恰处在政治与科学的紧密联系之中——作一番考察将是十分有益的。本论文的目的就是要对此作出一点贡献。

考察的基础是分析利用 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出版物。在这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仅指那些或者从其科学的自我认识或者从其政治活动以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居的历史学家,形式上也因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个术语的使用并非要把那些未加入中共的历史学家规定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要把那些在此被冠以这个称号的历史学家确认为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因概念使用而产生的限制外,还有另一个必要的限制。由于资料繁多,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人士探讨历史问题的主要出版物,示范性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情况。我选择了范文澜、何干之、侯外庐、胡绳、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他们早在 1949 年以前就着手研究历史问题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们也积极参与了建立一种广泛的、机构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活动,或者从其政治地位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2]。当然,关于选择的标准还要详细地予以规定。

在做了这样的预先声明之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就可以确立如下了:我把19世纪末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和2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输入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的前提来处理。30年代初发生的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的讨论则是中国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的第一次尝试。这些讨论标志着狭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始。借此,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有关的特殊的历史科学的起始点便被列举出来了。

30和40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自1937年起在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及其在抗日战争中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则构成了一般的政治联系框架。属于这个框架的还有从当时政治形势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关于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政治和文化一意识形态观点;历史学家恰恰以此为依据,他们甚至还参与了这些观点的表述。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分歧意见在统一战线和抗战初期可以分别用毛泽东和王明的名字来标识,这些分歧意见当然也反映到历史学家的著述之中,其情形正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逐渐得以贯彻一样。但

是在这里，历史学家决不只是某一已经被决定下来的政治路线的辩护士，而是整个争论过程的一个载体，这个争论过程出现在政治路线确立之前。

本论文所利用的历史学家的论著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历史科学范围，而是涉及：(1)关于现实政治，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论著⁽³⁾；(2)关于新的、与政治发展的新要求相适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的论著；(3)关于中国历史和历史理论问题的论著。只有把历史学家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包括在内，才能更好地考察这些观念对其历史科学论著的影响，并说明把政治观念转用到历史叙述方面的情况。

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历史学家关于政治问题的论著当作政治论文，把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著当作哲学一意识形态论文——即使也带有政治观点——来分类，但是对于那些研究历史对象的论著却很难分门别类。难就难在不好区别下列两种论著，一种论著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科学地编写中国历史；另一种论著则按照传统方法，借助于某一历史问题来讨论现实政治，它也具有政治论文或政治评论性质。这两种论著通常是无法作出明确区分的，因为两种成分往往共同出现在同一论著之中。对历史进行科学处理，主要表现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把特殊的中国的发展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而传统的把历史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的做法则主要是与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与之相应，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对象的论著：在有关规律性问题的章节中，除了介绍历史学家关于中国社会的“合法则”发展的理论观点外，也试图描述这些观点在各个历史学家那里的发展情况；而在关于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问题的章节中，传统的借助历史类比这一注疏学工具来接近历史的方法与包括历史比较法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历史学家当中的相互渗透问题则处于中心位置。

1.2 史料和研究状况

本论文的史料基础主要是那些被我挑选出来作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论著，包括他们在 1949 年以前的所有出版物：专著、学术论文和有关历史、政治、军事及其他问题的文章，还有书评和杂记——只要我能搜集到。个别情况下我也用了他们后来写作的东西。1949 年以前在其他作家⁽⁴⁾的部分文章和个别文章中，已经含有对历史学家自我的学术认识和历史科学的发展进程的反省了。这两种史料在此都被看作原始资料，只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与发展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史料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是作为历史科学发展的产物而形成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特定作用，即为这个发展进程提供证据，而且它们本身也是历史科学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叙述 30 和 40 年代的政治发展情况和传统的历史